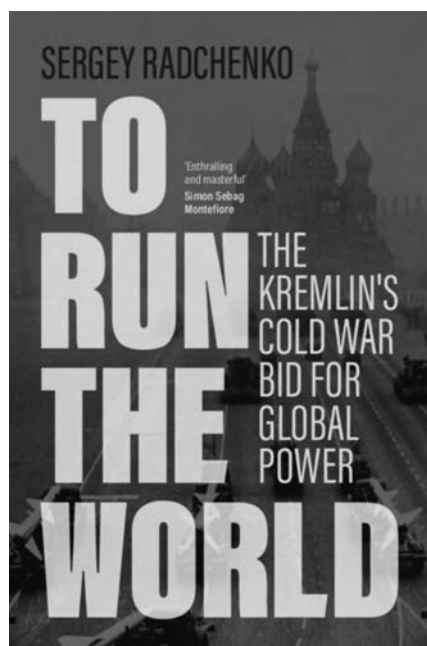


# 冷戰時期蘇聯外交決策再認識

——評 Sergey Radchenko, *To Run the World: The Kremlin's Cold War Bid for Global Power*

● 梁加農



Sergey Radchenko, *To Run the World: The Kremlin's Cold War Bid for Global Pow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4).

2022年春俄烏戰爭爆發，震驚了國際社會。冷戰結束後，人們一度認為在歐洲這樣的文明之地，

戰爭將會成為一去不復返的歷史現象；雖然俄烏戰爭前有關俄軍動向的情報源源不斷，但西方安全及情報部門的分析幾乎都認為真正的大規模戰爭不可能發生<sup>①</sup>。俄烏戰爭除了暴露西方軍備鬆弛（如炮彈生產遠遠不足），也刺激了學術界對克里姆林宮決策動機和過程的再研究，其中一個重要參照就是上世紀的冷戰史，而傳統的現實主義（國家安全）和理想主義（意識形態）解讀路徑似乎都面臨挑戰。

2024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拉欽科（Sergey Radchenko）所著《爭霸世界：冷戰時期克里姆林宮對全球權力的爭奪》（*To Run the World: The Kremlin's Cold War Bid for Global Power*，以下簡稱《爭霸》，引用只註頁碼）一書，視角獨特新穎，敘述嚴謹簡潔，對冷戰時期克里姆林宮領導人決策的心理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研究，立即引起廣泛關注。國際冷戰史研究先驅加迪斯（John L. Gaddis）給予該書高度評

俄烏戰爭刺激了學術界對克里姆林宮決策動機和過程的再研究，其中一個重要參照就是上世紀的冷戰史，而傳統的現實主義（國家安全）和理想主義（意識形態）解讀路徑似乎都面臨挑戰。

價，認為它不僅是一部重新反思冷戰史之作，也是對當今蠢蠢欲動者的警告<sup>②</sup>。

## 一 冷戰史的再考察

1991年冷戰結束以後，相關歷史問題受到國際學術界高度重視。自1990年代初以來，研究著作大量湧現。同之前的研究相比，這些新著除了繼續利用西方檔案資料以外，特別受惠於蘇聯及一些東歐國家檔案的解密，在研究方法、範疇、視角以及對研究對象的認識上都有很大突破，「新冷戰史」研究隨之興起，其中一部重要代表作是加迪斯的《冷戰》(*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sup>③</sup>，該著反映了基於多邊檔案和史料進行研究、建立新的解釋框架，以及意識形態的重新認識等特點。

同時，蘇聯解體後大批知識份子移居西方，基於自身的實際生活體驗和故土文化的深刻領會，對冷戰時期的蘇俄史進行了許多批判性研究。祖博克(Vladislav M. Zubok)的《失敗的帝國：從斯大林到戈爾巴喬夫》(*A Failed Empire: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一書<sup>④</sup>，以豐富的檔案材料結合口述史的訪談記錄為研究基礎，提出了「革命與帝國」的蘇俄當代史解釋範式，認為蘇聯是一個披着「革命」外衣卻保留「帝國」內核的怪物。一些西方歷史學家也利用一度開放的俄國檔案、訪談資料等，出版了多部蘇俄史的研究新著，其中以科特金(Stephen Kotkin)

的三卷本《斯大林》(*Stalin*)最為重要<sup>⑤</sup>。該著雖是傳記，實際上是一部從克里姆林宮看世界的蘇俄當代史，涉及歐亞大陸、地緣政治等問題，認為結構性原因雖然解釋了蘇俄的大部分歷史，但個人決定和意外事件卻決定了歷史的進程，具體而言就是列寧的突然離世使斯大林大權在握，形塑了蘇俄乃至世界的歷史。

尤其重要的是，2000年老牌的「劍橋歷史叢書」還立項為結束不到十年的冷戰修史，十年後出版了由著名歷史學家拉斐爾(Melvyn P. Leffler)和文安立(Odd A. Westad)主編、來自十八個國家的七十三位國際冷戰史學者分章撰寫的三卷《劍橋冷戰史》(*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sup>⑥</sup>，在很大程度上更新了人們對於現當代國際關係史乃至整個二十世紀世界史的一些基本認識。

經過近三十年的研究，從冷戰史、蘇俄史內涵方面說來，幾近窮盡有關的重要課題。然而，《爭霸》根據大量前蘇聯的檔案，以及克里姆林宮領導人的私人文件，在非常個人化的心理層面上重新解讀斯大林、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勃列日涅夫(Leonid I. Brezhnev)、戈爾巴喬夫(Mikhail S. Gorbachev)等不同時期蘇聯領導人的思想，並對蘇聯外交政策的根本動機進行了全新的解釋，重點關注莫斯科的合法性敘事，以及這些敘事在爭霸野心與外界承認之間不斷互動的過程。作者自謂就像一名心理諮詢師，面對面地傾聽客戶一遍又一遍地講述同樣的故事，以揭示其潛在

《爭霸》在非常個人化的心理層面上重新解讀不同時期蘇聯領導人的思想，並對蘇聯外交政策的根本動機進行了全新的解釋，重點關注莫斯科的合法性敘事，以及這些敘事在爭霸野心與外界承認之間不斷互動的過程。

的激情和恐懼(頁11),那就是蘇聯的意識形態與追求稱霸之間存在着巨大的實力差距,心理上有無法抑制的不安全感,從而渴望美國認可其大國地位。而且,這種外界的認可還是獲取合法性的一種形式,是蘇共意識形態上的自我合法化永遠無法取代的(頁3-6)。

拉欽科出生在前蘇聯,父母來自烏克蘭,在遠東的薩哈林島(中國稱庫頁島)長大。1995年拉氏作為交換生前往美國,然後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受文安立指導,獲得博士學位。他曾在寧波的諾丁漢大學分校任教四年,通曉中文、蒙文,也是《劍橋冷戰史》第二卷第十七章「中蘇分裂」(The Sino-Soviet Split)的撰寫者<sup>⑦</sup>,現為約翰·霍普金斯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Johns Hopkins SAIS)意大利博洛尼亞分部教授。

本書是拉欽科第三部蘇聯研究專著。前兩部分別是《天有二日:1962-1967年中蘇霸權之爭》(*Two Suns in the Heavens: The Sino-Sovi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 1962-1967*)和《不受歡迎的幻想家:冷戰末期蘇聯在亞洲的失敗》(*Unwanted Visionaries: The Soviet Failure in Asia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sup>⑧</sup>。《天有二日》考察冷戰時期複雜的中蘇關係,使用的新史料主要來自蘇聯,該書認為中蘇分裂是由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差異共同驅動的。批評者指出,雖然拉氏比較詳細地闡明了蘇方的戰略,但在涉及中方的敘述留下了一些空白,這主要由於他掌握的中國史料有限<sup>⑨</sup>。《不受歡迎的幻想家》研究1980年代尤其

是戈爾巴喬夫時期蘇聯的亞洲政策,認為戈氏雖然在改善與中國的關係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由於蘇聯入侵阿富汗以及俄日在千島群島的領土爭端,蘇聯在亞洲的整體影響力有所削弱。與前著比較,該書使用了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來自中國、印度等亞洲國家的新史料。《天有二日》和《不受歡迎的幻想家》可以視為《爭霸》的兩個個案研究,即中蘇雙邊關係和冷戰後期的蘇聯亞洲政策,而兩者在《爭霸》中又都進行了新的探討。

## 二 超級大國的心理博弈

《爭霸》將研究重新聚焦於冷戰中心的超級大國蘇聯,對克里姆林宮決策的心理,即長年的不安全感、自大的妄想和對美國認可的渴望如何推動莫斯科一意孤行地尋求全球權力,進行了深入探討,並循此思路對冷戰時期的蘇聯外交政策和活動進行了再考察和再認識,對其中的某些問題提出了全新的解釋。全書分四部分、二十章,前後是導言和結論。開篇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給未來幾代蘇聯領導人留下的心理陰影:赫魯曉夫在斯大林格勒戰場為堆積如山的陣亡德軍焚屍滅迹,以防瘟疫;勃列日涅夫在登陸黑海港口的行動中觸雷,頭部受傷,落入海中幾乎喪命;在鄉下生活的年幼的戈爾巴喬夫在饑荒中差點餓死(頁1-2)。

第一部分「野心」(Ambition)敘述了蘇聯從1944年二戰結束前夕到朝鮮戰爭(1950-1953),即冷戰

《爭霸》將研究重新聚焦於冷戰中心的蘇聯,對克里姆林宮決策的心理,即長年的不安全感、自大的妄想和對美國認可的渴望如何推動莫斯科一意孤行地尋求全球權力,進行了深入探討。

赫魯曉夫心理上對美國認可的渴望，在1959年歷史性地訪問美國中有充分表現。這位蘇聯領導人為與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會晤，就像為一次重要的考試做準備，花了數周時間進行深入研究。

的起源時期的決策。其中提到在1945年確定戰後大國勢力範圍的雅爾塔會議上，英美給予蘇聯領導人斯大林所迫切渴望的大國地位的認可（頁25）。1944年10月斯大林在餐巾紙上草草寫下的中歐和東歐各國勢力範圍百分比，獲得時任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默許，就是蘇聯新權威形象得到認可的體現（頁22-24）。

對於斯大林在朝鮮戰爭決策中的失算，即認為美國不會干預，書中披露了不少新史料。1956年9月，毛澤東曾問前來參加中共八大的蘇共代表團團長米高揚（Anatas Mikoyan）：斯大林改變主意、同意開戰的原因到底是甚麼？米高揚回答說：「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前，我們的情報部門破譯了敵人的電報，其中說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在給華盛頓的報告中指出，如果朝鮮和韓國之間發生軍事衝突，美國一定不能干預。」（頁137）作者以當年參與破譯電報工作的前蘇聯情報部門克格勃（KGB）官員的回憶作為佐證。書中還敘述了蘇聯間諜網對美國核心機密的竊取，如1940年代研製第一顆原子彈的「曼哈頓工程」（Manhattan Project，頁47），並指出蘇聯間諜也可能接觸到1950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會議第48號紀要（NSC-48），該會議確定了美國不會軍事介入中國大陸及朝鮮半島衝突的原則，只是無從考證斯大林是否讀到此文件（頁136）。

第二部分「驕狂」（Hubris）敘述19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斯大林的繼任者赫魯曉夫在外交政策上採

取魯莽的冒險主義和核邊緣政策。其中提到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即蘇聯在鄰近美國的古巴部署中程核導彈這一以國運相賭的決定，其動機並非引發戰爭，而是希望與美國平起平坐，因為美國在靠近蘇聯邊境的土耳其等地同樣部署了核導彈（頁320-26）。

作者指出，赫魯曉夫心理上對美國認可的渴望，在1959年歷史性地訪問美國中有充分表現。這位蘇聯領導人為與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總統的會晤，就像為一次重要的考試做準備，花了數周時間進行深入研究，「向速記員口述備忘錄，試圖在向艾森豪威爾提出陳述之前理清心中的關鍵問題」，像對着鏡子一樣練習問答（頁238）。作者將1962年中印戰爭一節置於本部分第十一章「古巴」裏敘述（頁306-12），提到當蘇聯秘密將導彈運進古巴、美國內部討論應對方法之時，赫魯曉夫還在為如何在中印衝突中站邊而煩惱——蘇聯與中國雖已有爭吵但還是盟國，而印度又是蘇聯極力爭取的第三世界中有影響力的大國，反映了其微妙的心理掙扎。不過，本部分對印度、印度尼西亞、南斯拉夫在冷戰中發起的頗具影響的不結盟運動關注不多。

第三部分「衰落」（Decline）敘述了古巴危機後不久，赫魯曉夫在一場政治局政變中被勃列日涅夫取代，東西方關係開始進入緩和（détente）時期，這也是蘇聯在冷戰期間最接近獲得其認為應得的認可的時期，世界分為兩極，蘇聯是



其中一極。但是隨着蘇聯內部的衰落，這一高光時刻轉瞬即逝。

作者指出1975年簽署《赫爾辛基協議》(*Helsinki Final Act*)是緩和時期蘇聯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表明蘇聯的關鍵外交決策往往基於蘇聯領導人對西方反應的預期。勃列日涅夫心理上非常在意西方承認蘇聯對東歐統治的合法性，為此在簽署協議時作出重大讓步，同意加入西德要求的和平改變邊界的條款，以及西歐國家要求的普世人權的條款，儘管這對蘇聯在國內的極權統治非常不利(頁436-38)。作者還披露了一則中美之間鮮為人知的舊事。1979年1月鄧小平訪問美國時，與卡特(James E. Carter)總統討論針對蘇聯的軍事合作，美方提議在新疆設立情報收集站，以監視蘇聯在中亞的戰略通訊。後來鄧曾提出條件，即美國向中國出售武器，特別是一個中隊的F-14、F-15甚至F-16戰鬥機；美方沒有同意，不過監測站還是建立起來了(頁460-61)。這讓人聯想到過去一年多來國際上熱議不斷的西歐諸國向烏克蘭轉讓F-16戰鬥機的新聞。

第四部分「崩潰」(Collapse)敘述了蘇聯最後十年，年富力強的戈爾巴喬夫從去世的勃列日涅夫及其二位短暫的高齡繼任者安德羅波夫(Yuri Andropov)和契爾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手上接過權力，這一時期最突出的方面是蘇聯合法性敘事的衰落。面對積重難返的國內問題，戈爾巴喬夫在對外政策上大幅收斂，在東歐鉅變、柏林牆倒下之際仍沒有像前任領導人那樣，發動柏林封鎖或者出兵干涉匈

牙利(1956)、捷克斯洛伐克(1968)、阿富汗(1979)等，他需要專注於國內急迫的問題。事實上，承認蘇聯是美國的對等大國，對戈爾巴喬夫來說已經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但他專注於內政、使蘇聯重新強大的嘗試還是失敗了。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蘇聯後期史研究中引人注目的莫過於1983年11月人類曾與核戰爭擦肩而過的敘述：北約(NATO)進行核演習時更換密碼，導致蘇聯情報部門誤判是核襲擊的前兆，蘇方準備先發制人，核按鈕送到當時已臥病在牀的蘇共中央總書記安德羅波夫面前。安德羅波夫躊躇之際，蘇方收到潛伏在布魯塞爾北約總部、持有北約內部最高級別涉密許可證(security clearance)的東德間諜發來的查無此事的報告而決定不採取行動<sup>⑩</sup>。本書作者引證了相關資料，對此敘述持比較保留的意見，有待後證(頁535-36)。

### 三 意識形態、「大小三角」和種族動機

《爭霸》有幾個比較新穎、獨到的論點和視角值得注意，以下就意識形態、「大小三角」和種族動機三方面略加評點。

在新冷戰史的研究中，中國學者比較強調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如沈志華和李丹慧指出社會主義國家間關係中誰是馬克思主義正統、誰是領導者的問題，對冷戰時期中蘇關係產生關鍵性影響<sup>⑪</sup>。陳兼關於中國派兵參加朝鮮戰爭決策過程的

《爭霸》雖然不認為意識形態居於冷戰時期決策過程的中心，卻並不忽視其重要性。除了渴望獲得美國等西方大國的認同，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領導地位也需要獲得認同，首先是中國的認同。

拉欽科在《不受歡迎的幻想家》中指出戈爾巴喬夫曾經試圖在蘇聯、印度和中國之間建立「戰略三角」，繼而於《爭霸》中提出此前還有一個蘇聯、中國、越南的三角關係，認為越南戰爭是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尤其是中蘇之間的鬥爭。

研究，認為其背後與中共動員群眾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有關<sup>⑫</sup>。《爭霸》雖然不認為意識形態居於冷戰時期決策過程的中心，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沒有充分解釋蘇聯的行為」（頁3），卻並不忽視其重要性，尤其是意識形態如何發揮作用。除了渴望獲得美國等西方大國的認同，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領導地位也需要獲得認同，首先是中國的認同（頁6-7）。1950年代中共甚至直接影響了蘇聯的重大外交決策，如1956年匈牙利事件，在蘇共猶豫不決時，應邀列席蘇共中央主席團（政治局）會議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總書記鄧小平具意識形態色彩的強硬意見發揮了重要作用（頁194-95）。

1960年代中蘇分裂、70年代初中美和解，形成眾所周知的美、蘇、中三角關係。值得注意的是，拉欽科在《不受歡迎的幻想家》中指出80年代戈爾巴喬夫曾經試圖在蘇聯、印度和中國之間建立「戰略三角」<sup>⑬</sup>，繼而於《爭霸》中提出此前還有一個蘇聯、中國、越南的三角關係（頁346），並作了大幅敘述和分析，認為越南戰爭只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理解是不夠的，還要從中俄領導人心理以及領導權爭奪的角度來理解；它不僅是東西方的鬥爭，也是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尤其是中蘇之間的鬥爭（頁356-57）。60年代越戰升級，與中蘇分裂、中共公開挑戰蘇共在國際共運中的領導地位同步。對越南抗美救國戰爭的立場成為檢驗領導資格的試金石（頁241），中共指責蘇共背叛越南（頁332），而在蘇共對越戰

的考量中，中國因素也遠甚於西方（頁356）。中蘇兩國爭相拱火，越戰欲罷難休。

與中共挑戰蘇共在國際共運中的領導地位一樣，越共也在挑戰中共，形成三角關係中新的張力。河內不滿北京沒有承認胡志明作為國際共運偉大領袖之一的地位，而北京則聲稱毛澤東是僅次於列寧的第二偉大領袖。但是，在作者看來，中國在朝鮮只與美國打了個平局，越南與美國作戰反而更勝一籌，成為亞洲的另一個榜樣、另一個領導者（頁349）。

發人深省的是，本書提出了以往不太為研究者注意的蘇聯領導人推行緩和外交政策背後的種族主義動機。正如科特金多次強調的，蘇俄在文化上屬於歐洲，雖然體制仍然是非西方憲政；即便在今天俄烏戰爭的背景下，其精英階層仍然不希望與歐洲永久脫鉤而倒向東方的中國<sup>⑭</sup>。本書指出，斯大林就是歐洲主義者，雅爾塔會議後蘇聯與美國爭奪的重點亦是歐洲（頁39-68）。戈爾巴喬夫也自我認定為「歐洲人」（頁586）。勃列日涅夫在推動緩和時，更有涉及種族主義的評論。19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國際緩和和大好局面的出現，時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美國總統尼克松（Richard M. Nixon）及其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以及西德總理勃蘭特（Willy Brandt）被視為其政策架構師。勃氏認為歐洲人應該團結在一起，「我們的國家擁有大量的武器。如尼克松總統曾經說過的那樣，你可以摧毀我們七次，我們可以摧毀你七次。我告訴

他，在這發生之後，白人將消失，只剩下黑人和黃種人」(頁380)。而對於中國，勃氏認為中國人「殘暴、背信棄義和虛偽」，「不值得尊敬」(頁364)。後來鄧小平在談到中蘇分裂的原因時，認為意識形態論爭乃是「空話」，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sup>⑮</sup>，雖然他沒有明確提到種族主義。

#### 四 若干不足和疑問

冷戰是東西方全面、長期的對抗，涵蓋許多不同的方面，《爭霸》主要對克里姆林宮領導人的決策心理學進行探討，而對結構性因素，意識形態，蘇聯國內政治、經濟和社會，以及與西方科技差距的不斷擴大等對決策的影響涉及不多，比如蘇聯在關鍵的芯片技術競爭中出局<sup>⑯</sup>。

此外，冷戰前後近半個世紀，當過蘇聯第一把手的有六人，其中的不少變化或多或少影響到決策過程和動機，難以一概而論，本書對此也重視不夠。戈爾巴喬夫時期的外交決策如果沿用1985年之前的解釋，即主要聚焦於蘇聯作為超級大國的地位、認可和合法性，就比較牽強。國內財政經濟每況愈下的蘇聯同意從東德撤軍、使得兩德完成歷史性統一的關鍵，是西德向蘇聯支付120億德國馬克；用曾任美國國防部長的蓋茨(Robert Gates)的話說，蘇聯是被「賄賂」撤軍的(頁586)。這與斯大林時期進軍德國、攻克柏林前後的雅爾塔、波茨坦會議上蘇聯的態度和動機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勃列日涅夫是冷戰時期蘇聯執政最久的領導人。  
(資料圖片)

至於歷任領導人的篇幅分布方面，《爭霸》的敘述略顯不平衡。書中勃列日涅夫可謂一號主角，對他着墨甚多。他在位十八年，是冷戰時期蘇聯執政最久的領導人，比他的對手美國及西方多國領導人的執政時間都長。1964年勃氏剛上台時，與他有過直接接觸的朝鮮領導人金日成和鄧小平私下議論說，「看起來這個人有點木頭木腦的，反應很遲鈍」<sup>⑰</sup>。過去史家一般視勃氏為平庸之輩，關注者少，本書對勃氏的描述對於更加實際地評價其歷史貢獻很有幫助。與之形成對照的是，本書對冷戰時期美國總統中通常也被視為平庸之輩的卡特着墨甚少，是一個明顯的不足之處。實際上，卡特政府當局將冷戰擴展至人權、民族等領域是可圈可點的，而本書幾乎忽略了這些方面；對於頗有影響力的蘇聯異見人士，書中只是順帶提到過著名物理學家薩哈羅夫(Andrei Sakharov, 頁454)，至於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

過去史家一般對勃列日涅夫關注較少，本書對勃氏的描述對於更加實際地評價其歷史貢獻很有幫助。本書對美國總統中通常也被視為平庸之輩的卡特着墨甚少，但卡特政府當局將冷戰擴展至人權、民族等領域是可圈可點的。

中蘇珍寶島武裝衝突後，廣泛流傳蘇聯曾考慮對中國進行先發制人的核打擊。《爭霸》認為「沒有理由認為蘇聯在任何時候認真考慮過對中國開戰，包括最緊張的1969年」。那麼，這是虛驚一場的假情報嗎？

仁尼琴 (Alexander Solzhenitsyn) 則沒有提及。然而，人權議題和西方對蘇聯異見人士的支持，也是緩和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在冷戰史的重大事件方面，本書留有個別未解之處。如1969年3月蘇軍在中蘇有爭議的邊界島嶼珍寶島遇中方伏擊、爆發嚴重武裝衝突後，廣泛流傳蘇聯曾考慮對中國進行先發制人的核打擊，而中國確實進行了全面戰備動員。在廣為人知的基辛格回憶錄《白宮歲月》(White House Years) 中，也提及蘇聯曾經考慮對中國發動先發制人的核打擊的可能性<sup>⑧</sup>。但是，多年以後媒體上出現的繪聲繪色的諸多細節描述<sup>⑨</sup>，則缺乏可靠的史料支持，尤其沒有蘇聯、美國檔案佐證。而《爭霸》經過分析，認為「沒有理由認為蘇聯在任何時候認真考慮過對中國開戰，包括最緊張的1969年」(頁369)。那麼，這是虛驚一場的假情報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或者核訛詐 (nuclear blackmail) 嗎？本書沒有答案。

## 五 小結

俄烏戰爭已進入第三個年頭，對壘兩軍死傷百萬。面對殘酷的現實，驀然回首過去一百多年人類經歷的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相比於造成數以千萬計生命損失的兩次熱戰，頓感冷戰其實是一個最佳選擇，而且實際上「冷戰2.0」已經拉開序幕，比如美國對中國實施高科技出口管制。雖然西方還沒有建立像冷戰時期的巴黎輸出管制統籌

委員會 (CoCom)，但美國、荷蘭、日本和台灣已在關鍵的芯片技術方面協調出口管制；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核潛艇夥伴關係 (AUKUS) 則可謂冷戰時期核威懾戰略的印太地區微縮版。而最近朝鮮不遠萬里派兵到烏克蘭東部參戰，與冷戰時期東西方陣營在朝鮮半島的情景相似。加之曠世怪傑特朗普 (Donald J. Trump) 即將重返白宮，國際態勢恐將愈益傾向冷戰化。

拉欽科的《爭霸》出版恰逢其時，對冷戰中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和戈爾巴喬夫如何追求合法性、為甚麼想爭霸世界，以及如何試圖平衡革命、安全和合法性的要求，進行了再考察和再認識，其中提供了豐富的關於冷戰中重要事件的新史料以及極具啟發意義的整體解釋，相當一些內容更無不令人聯想到當今國際態勢。本書出版後僅僅三個月，加迪斯的書評就成為在現下國際安全及外交決策圈頗有影響力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月刊封面文章，這對於一本大學出版社的史學專書來說是不尋常的，在在凸顯了其現實意義。

### 註釋

① 無獨有偶，1941年夏，斯大林面對多方關於德國即將發動進攻的情報(包括潛伏在德軍總部的情報員的警報)，在詳細分析現實局面後，認為戰爭並不可能。參見Stephen Kotkin, "When Stalin Faced Hitler: Who Fooled Whom?", *Foreign Affairs* 96, no. 6 (2017): 48-71。

② John L. Gaddis, "Why Would Anyone Want to Run the World?"



The Warnings in Cold War History”, *Foreign Affairs* 103, no. 4 (2024): 155-61.

③ John L. Gaddis, *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5).

④ Vladislav M. Zubok, *A Failed Empire: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⑤ 參見 Stephen Kotkin, *Stalin: Paradoxes of Power, 1878-1928* (New York: Penguin Random House, 2014); *Stalin: Waiting for Hitler, 1929-1941* (New York: Penguin Random House, 2017)。  
《斯大林》第三卷(1942-1953)的出版推遲到2025年，副標題也從「失算與毛的侵蝕」(Miscalculation and the Mao Eclipse)改為「極權超級大國」(Totalitarian Superpower)。

⑥ 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 Westad, eds.,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 13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⑦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 2, 349-72.

⑧ Sergey Radchenko, *Two Suns in the Heavens: The Sino-Sovi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 1962-1967*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9); *Unwanted Visionaries: The Soviet Failure in Asia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⑨ David Schimmelpennick van der Oye, “Sergey Radchenko, Two Suns in the Heavens: The Sino-Sovi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 1962-1967”,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84, no. 1 (2012): 284-85.

⑩ Taylor Downing, *1983: Reagan, Andropov, and a World*

*on the Brink* (New York: Da Capo Press, 2018), 250-53.

⑪ Zhihua Shen and Danhui Li, *After Leaning to One Side: China and Its Allies in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⑫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⑬ Sergey Radchenko, *Unwanted Visionaries*, 100-101.

⑭ Stephen Kotkin, “The Five Futures of Russia and How America Can Prepare for Whatever Comes Next”, *Foreign Affairs* 103, no. 3 (2024): 64-83.

⑮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1275。

⑯ Chris Miller, *Chip War: The Fight for the World's Most Critical Technology* (New York: Scribner, 2022).

⑰ 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845。

⑱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MA: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82), 233.

⑲ Mark O'Neill, “Nixon Intervention Saved China from Soviet Nuclear Attack”,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2 May 2010, [www.scmp.com/article/714064/nixon-intervention-saved-china-soviet-nuclear-attack](http://www.scmp.com/article/714064/nixon-intervention-saved-china-soviet-nuclear-attack).

梁加農 加拿大聯邦政府公務及採購部合約架構師，原中國浙江絲綢工學院絲綢史研究室副主任。